·构建中国经济学、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思路

——兼论中国特色国民经济学探索历程与东财贡献

杜两省[1]，吕　丹[2]，周　彬[3]

（1. 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2. 东北财经大学 投资工程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3. 东北财经大学 东北全面振兴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摘　要：围绕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思路这一核心议题，本文在回顾和分析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简史及中国特色国民经济学探索历程的基础上，总结了东北财经大学在探索中国特色国民经济学和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贡献。首先，本文从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经济思想的演变过程和科学方法论的变革逻辑三个维度，系统分析了国民经济学的产生原因、存在基础、演进过程和发展方向，揭示了国民经济学与早期政治经济学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关系，进而指出国民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其次，本文从构建基础、指导思想、价值判断、目标选择、技术工具和学科内容等方面，提出了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思路。最后，本文提出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管理的目标是可持续、公平、代际均衡地增进全体国民综合福利，从而为共同富裕战略目标提供了精确、全面、丰富的解释。

关键词：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国民经济；全体国民综合福利；东北财经大学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6）09-0003-16

一、引　言

国民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最早形成的经济学科，它的思想早已深入并持续影响理论经济学及应用经济学的研究。随着经济科学的发展和分化，目前世界上只有部分国家的经济学学科体系明确设立国民经济学，中国即为其一。

中国国民经济学是从国外特别是从苏联引入的，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中国国民经济学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它既不同于当代西方作为主流的宏观经济学，也不同于在德语区和北欧国家一直存在并持续发展的国民经济学。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随着经济增长日益提升，加之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国民经济学也受到了国内外关注。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如何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解释中国道路和“中国奇迹”，提升中国经济学的

收稿日期：2026-05-30

作者简介：杜两省（1958–），男，山西临猗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E-mail：duliangsheng @vip. sina. com
吕　丹（1978–），女，辽宁沈阳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和投资决策研究。E-mail：emmalv@163. com
周　彬（1980–），男，安徽利辛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公共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研究。E-mail：dlzhoubin@sina. com

国际话语权，并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显得尤为重要。对此，东北财经大学（下文简称“东财”）进行了积极探索，通过深入研究国民经济学的产生原因、存在基础、演进过程和发展方向，为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东财智慧。

二、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简史

国民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特定的研究目的和科学的演进逻辑。

经济学的思想最早产生于古希腊家政管理的实践，其目的是有效取得并节约使用财富。尽管这种思想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已经形成，但它只是家政管理艺术而非经济科学。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基于家国同构理念，将古希腊家政管理的思想用于国家治理，在经济上一方面努力为国民提供充裕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增加公共建设并进行国家治理上的改革[1]。1615年，法国重商学派代表人物蒙克莱田从国家角度研究经济问题，在《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概括了亨利四世治国的实践，影响了后来为路易十三辅政的宰相黎塞留的政策选择，成为当时法国通过强化国家权力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由于该书首次提出“政治经济学”（Économie Politique）这一术语，强调研究治国理政而非家政管理，因而被视为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奠基之作，但从该书内容及其与家政学的关系看，可以说当时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国民经济学学科的最早形态。首先，它与古希腊家政管理的经济学思想相对应，研究的是治国理政的经济学。其次，它的研究范围限定在特定国家的经济，而非某个地区或整个世界。再次，它的研究核心是国民，目的是探讨如何增进一国国民的福利。最后，它认为增进国民福利需要依靠国家力量，并运用政治方式来实现。根据这四个特征来判断，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其实就是国民经济学，二者是同一学科的不同名称。

17世纪中期以后，政治经济学（或者说国民经济学）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得到了快速发展，一直到18世纪中期，它的基本内容均限定在研究国家如何为人民生活及公共事业提供资金支持。然而，随着学科发展，政治因素逐渐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国家作用自然也被淡化。首先，思想上的转变导致国家作用被淡化。18世纪中后期，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765年，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明确提出，国家的任务不是通过对工业和贸易制定法律来为人民提供充裕的收入，而是遵循并保护简单且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如果政府实行不干预政策，这个法则会以最好的方式调节财富的生产[2]。斯密对其思想进行了深化和拓展。斯密认为，通过自利的社会成员之间自发甚至是无意识的劳动分工而进行的财富生产、分配和交换过程，本身就能够为人民提供充裕的收入或生活资料，不需要政府干预[3] 425-444。按照斯密的思想，经济学中“国家如何为人民提供充裕的收入或生活资料”这第一项任务的实现路径就简化为“自由放任”[4]，并逐渐成为经济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至于第二项任务，即“国家如何为公共事业提供足够收入”，也在新兴经济科学的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更新：其中一部分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如公共财政），而另外大部分构成了政治学研究的对象。由于人们把经济学主要看作是科学，而将政治学看作是艺术，政治因素就逐渐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到19世纪末，“政治经济学”一词逐渐被“经济学”取代，政治学和经济学分化为不同的学科。其次，方法论上的变革导致国家作用被淡化。随着政治学和经济学分化为不同学科，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主要转向了市场机制，相对忽视了政治和制度因素，以及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对方法论进步的渴求和对更为缜密的经济分析基础的期望，是这种分化的重要动力。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强调在严格定义的约束条件和市场环境中消费者和厂商的最优化，有意淡化政治、制度因素和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基于同质性分析，推导出微观个体的最优化就是整个经济的最优化，对一个国家适用的结论也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这种分析方法忽略政治因素和国家差别，确实推动了作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化”，甚至造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即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成本—

收益、边际与均衡分析等理论方法，系统介入政治、法律、婚姻、犯罪、教育、宗教等非经济领域开展研究，而这又反过来推动了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开始运用主流经济学所形成的科学方法，探讨在经济社会中广泛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条件下，政治因素对经济的影响，这一传统在当代西方学界得到了新的继承与发展，演变为方兴未艾的“新政治经济学”。

1774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奥特斯在《国民经济论》一书中使用了“国民经济学”一词，用以表示它是研究一国国民整体财富和经济运行的学问，从而更加明确地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从传统的古希腊以来的家政管理，拓展到了国民经济层面，形成了以国家为单位的系统性经济学研究范式[5]。至此，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研究分成两个支流：一个是在英法两国进行的名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后来不断淡化政治和国家的作用，逐渐演变为作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另一个是在德语区和北欧国家进行的名为“国民经济学”的研究，这一传统延续至今。

从国民经济学的发展看，真正使其成为独立经济学学科的是19世纪德国的历史学派。1841年，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系统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教条，认为古典经济学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缺陷——那种抽象的“世界主义”，因为它忽视了国家的存在和民族利益的差异。李斯特认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国民经济学，它必须以国家为单位，服务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和民族利益，而非抽象的全人类利益。李斯特明确将“国民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经济学”对立，将国民经济学定义为研究如何使某一特定国家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实现农工商业富强、文化与力量提升的科学[6]。1843年，为了对抗英国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张，罗雪尔整理出版了《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该书在研究方法上运用历史归纳和经验观察取代抽象演绎，反对普适规律的存在性；在政策主张上，罗雪尔认为，经济与社会、文化、法律、国家密切相关，有其自己的发展阶段，必须以国家为中心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和贸易保护，以维护德国的国民经济[7]。罗雪尔的这本著作被称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宣言”，它正式确立了国民经济学的核心学科框架，深刻影响了经济学在德语区的发展。

罗雪尔之后，德国的国民经济学经历了从历史主义到社会政策，再到秩序自由主义，最后到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无论如何，德国国民经济学始终坚持国家整体性、历史语境、社会公正的德国传统，同时又不断吸收主流经济学及其他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例如，德国国民经济学吸收并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理论，但德国历史学派的经验主义与秩序观仍有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德国经济学范式。

当前，在德国及德语区的奥地利、瑞士和列支敦士登，大学的经济学和管理学专业普遍开设国民经济学课程，它与企业经济学并列，是公立大学经济学教育的两大核心支柱，慕尼黑大学、曼海姆大学、柏林洪堡大学等顶尖院校均将其作为核心专业。如今德国国民经济学已经与现代主流经济学融合，课程体系完整涵盖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核心领域，但同时也保留了其诞生之初的核心特质——强调经济理论与国家政策实践的结合，注重制度、历史与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系统性分析。该专业与德国央行、政府经济部门、欧盟机构保持深度的研究与实践联动，是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与制定的核心人才培养体系。在北欧国家中，瑞典仍然明确保留国民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正式名称和系所建制，国民经济学依然是经济学的核心基础学科。在中国，国民经济学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独立学科体系，它是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主要研究国民经济的运行目标、宏观调控、发展规划、经济安全和共同富裕等重大现实问题，并为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在世界其他地区，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名称虽然消失，但它的思想已经渗透到现在的经济学中。例如，在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地区，以新李斯特主义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思想，逐渐成为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探索本土发展路径的理论来源，被广泛用于解释这些地区所遇到的工业化困境、技术依附现象和经济主权缺失等问题。

综上所述，从世界范围看，中国之外的国民经济学虽然不会消亡，但也难以重回主流地位。它拥有不可替代的发展空间和长期生命力，并非以替代主流经济学为方向，而是作为主流范式的补充、特定区域的核心学科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持续发挥独特价值。

国民经济学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主要源于主流经济学的局限性和现实经济的新需求。首先，全球经济格局重构让“国家本位”的经济分析重新成为核心议题。逆全球化浪潮、全球经济治理碎片化、大国经济博弈加剧，以及各国对产业链安全、经济主权、技术自主可控的普遍重视，使得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发展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的核心命题。其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系统性缺陷为国民经济学提供了替代性的理论空间。国际金融危机、全球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问题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市场万能论”“去国家化”等主张的系统性缺陷，全球学术界与政策界均在寻找替代性的理论框架。国民经济学的核心主张——重视国家对经济的引导与保护、兼顾市场效率与国民整体福利、拒绝照搬普适性政策模板，正好契合各国摆脱新自由主义束缚、探索适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需求。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后发国家工业化与经济追赶的理论体系，这是主流经济学无法替代的。最后，现代经济学的融合发展趋势为国民经济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国民经济学正在与现代经济学的前沿方向深度融合：它与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融合，形成了关于经济发展路径依赖、国别制度差异的系统性分析，有助于弥补主流经济学忽视历史与制度维度的短板；它与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融合，形成了更契合后发国家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和经济转型的理论；它与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等新兴议题融合，拓展了研究边界。

然而，国民经济学的发展也受到一定限制，使其难以重回全球主流经济学的核心。首先，主流经济学的范式难以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现已成为全球经济学界的通用“学术语言”，国民经济学强调的综合性、制度性和历史性分析难以进入主流学术评价体系的核心，难以成为全球统一的通用范式。其次，学科边界的模糊性制约其独立发展。传统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大部分已经被现代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财政学和产业经济学等细分学科所分解和覆盖，若不能形成清晰、独特的研究对象与方法论体系，很容易被边缘化，沦为“大杂烩”式的综合性学科，失去独立的学术地位。最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并未根本逆转。相较于普适性的经济学理论，国民经济学强调国别特殊性的视角，决定了它更适合作为补充性的分析框架，而非全球通用的统一理论。因此，需要探索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三、中国特色国民经济学的探索历程

中国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经历了从借鉴外来理论到形成自主探索的独特路径。它并非简单照搬西方或苏联的模式，而是在解决中国经济实践问题过程中的逐步探索。

（一）萌芽与传入：早期的思想渊源（1899—1949年）

国民经济学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中国的。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国民经济学”这一概念被引入中国。马克思受德国经济学界用语习惯的影响，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常将“国民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同义词来使用。例如，马克思在早期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国民经济学”一词41次，却一次也没有用“政治经济学”[8]。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入，中国学术界也开始理解并使用“国民经济学”这一概念。

第二，中国学者对西方其他经济学著作的译介。20世纪初，国内开始翻译出版来自德国、日本等国的《国民经济学》相关著作。1914年，中国翻译出版德国学者弗克斯的《国民经济学》，1915年翻译出版日本经济学家津村秀松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938年又翻译出版德国经济学家狄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虽然这一时期主要还是引进西方和日本的国民经济学思想，

尚未形成系统的中国本土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但它为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二）影响与借鉴：苏联模式的深刻烙印（1950—1977年）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缺乏经验，经济建设与学科发展都转向学习苏联，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学”的实质内容与“国民经济计划”高度重合，特别是从“一五”计划开始，中国更是全面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理论。由于“有计划、按比例”及后来增加的“高速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体现，“计划”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核心，国民经济计划学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核心。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最先在全国创建国民经济计划学科，聘请苏联专家讲授国民经济计划学，成为新中国国民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的摇篮。东北财经大学的前身之一——东北计划统计学院于1951年创办经济计划系，开设了工业计划、农业计划和贸易计划三个专业，讲授国民经济计划课程并培养国民经济部门管理的专业人才。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计划系编写出版《国民经济计划讲义》，1958年、1962年又结合中国实践进行修订，被全国高校广泛采用。此时“国民经济学”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理论基础，旨在总结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从基本框架看，国民经济学以计划编制方法为核心，形成“理论—方法—部门”三位一体的结构。从学科特点看，国民经济学将整个社会视作一个“大工厂”，而企业只是其中的“车间”，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以指令性计划为主，聚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运行模式。虽然孙冶方、薛暮桥等经济学家对这种传统计划体制的弊端进行过反思，提出重视价值规律和经济核算的思想[9-10]，但并未得到认同。

（三）转型与探索：国民经济管理学阶段（1978—1992年）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国民经济学学科迎来了关键转折，它开始扬弃苏联模式，转向研究更具普遍意义的国民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1980年前后，学术界开始呼唤建立一门以国民经济整体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1982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12所高校的21位学者集体编写《国民经济管理概论》，标志着学科从“计划学派”转向“管理学派”[11]。1986年，辽宁大学在全国率先将“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改为“国民经济管理”专业。1980年，北京大学经济系开设国民经济管理本科专业。1986年，宋则行和汪祥春主编《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概论》，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理论研究的先河，为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理论指导[12]。1986年，厦门大学钱伯海出版中国第一部自主编写的《国民经济学》，作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广泛使用。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学”的学科特点是开始引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重点转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调控等问题。

（四）确立与探索：国民经济学独立学科阶段（1993—2011年）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之后，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方向发生了变化，内容也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从传统的计划管理拓展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周期与波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产业政策、国民经济核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1998年，教育部对全国高校学科专业进行重大调整，正式将国民经济学列为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研究生专业）。同时，在本科专业目录调整后，将相关专业统一规范为“国民经济管理”。这一时期，吴敬琏、厉以宁、张卓元、宋则行、汪祥春、胡乃武、樊纲等学者在宏观经济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与波动等领域发表了大量论文，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五）发展与创新：中国特色的形成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2012年至今）

进入新时代，中国在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国民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加快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其具体表现是：中国学者坚持“两个结合”，不断完善中国国民经济学的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积极进行理论研究，发表大量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成果，出版有影响力的教材，建设高水平的研究队伍。以教材建设为例：2018年，林木西和黄泰岩对其主编的《国民经济学》进行了第三版修订，该书作为国民经济学领域一部多次获奖的权威教材，集中体现了该领域的前沿研究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新实践。2025年，刘瑞、杨艳和李春生主编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原理》，该书成为原理级的本科生权威教材。

总之，中国国民经济学走过了一条“借鉴—转轨—自立—创新”的道路。它源于中外多元思想，扎根于中国经济的伟大实践，最终成长为最能体现中国宏观调控和经济治理独特智慧的经济学分支之一。

四、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思路

2025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国民经济管理系课题组在“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发布与研讨会上提出，国民经济学的核心标识性概念是“国民经济”，理论框架由“价值观底座—运行规律理论—治理工具体系”构成[13]。这一成果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中国国民经济学发展有重要贡献。

东财正在探索发展具有中国特色而又能够与现代经济学对接的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思路。

（一）构建基础

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基础是“国家—国民—国别”三位一体，其中，国家是前提，国民是核心，国别是基础。具体地，国家的存在是国民经济学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在全球化浪潮之后，坚持国家性体现为重视国家的作用，从一国出发思考问题，这对于大国而言尤为重要。国民是国民经济学的核心。实现可持续、公平、代际均衡地增进全体国民综合福利，就是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国民经济管理努力实现的目标。由于国民存在行业、地域、代际和身份的差异，因而需要根据历史、运用政治制度和政策手段对差异进行协调，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国别是基于特定国家的历史文化、制度背景和发展阶段形成的国民经济特征及宏观管理方式。国家之间的差异性使得国民经济呈现的独特性区别于普遍性、区别于同质化的国家，即需要从中国独特国情出发研究国民经济。鉴于中国经济的独特性，中国国民经济学既超越了西方一般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也区别于德国传统的国民经济学。

（二）指导思想

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遵循“两个结合”的根本路径。具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国民经济学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为重要使命和根本任务，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国民经济学研究的引领作用。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新时代国民经济管理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以增进国民福利为目标，明确国民经济管理的价值导向。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汲取其中蕴含的经济智慧。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从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现实中挖掘材料、发现问题、提出观点、构建理论。运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运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形成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规律的分析框架，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归纳形成国民经济治理工具体系。

（三）价值判断

国民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中的二级学科，它既是规范经济学，也是实证经济学，但在起点上就具有规范经济学的特点。其价值判断不再是“价值中立”的技术工具论，而是贯穿人民立

场、制度批判、公平正义、人的全面发展四大核心取向，形成鲜明的规范性判断体系。这种价值判断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资本逻辑、效率优先和价值中立，形成“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的完整价值评价体系。在根本立场上，坚持人民至上，发展为了人民，这在国民经济学中的体现就是将增进全体国民综合福利与实现可持续、公平、代际均衡发展确立为国家管理经济的目标。在制度判断上，把握以生产关系性质为核心的正义尺度。在发展判断上，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在历史判断上，坚持以社会进步规律为导向的批判思维。

（四）目标选择

价值判断是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基础，国家将价值基础内化在目标选择中，用以协调国民经济运行。国民经济管理包括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充分就业、维持价格水平稳定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四个基本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国民经济管理，除了在以上四个基本目标的内涵上有所拓展外，通常还包括推进收入分配公平与共同富裕、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注重民生保障与社会稳定、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目标。

国民经济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可持续、公平、代际均衡地增进全体国民综合福利。这个最终目标并不是操作目标，而是方向性与指导性的总纲，是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的顶层目标。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目标，所有政策必须满足以下三个刚性约束：第一个是限制性目标（底线层），包括维持价格水平稳定、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注重民生保障与社会稳定、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第二个是作为实现更高目标的手段和路径的阶段性目标（工具层），包括推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促进充分就业；第三个是实现性目标（状态层），包括推进收入分配公平与共同富裕、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当然，目标体系之间存在辩证关系与动态调整。一方面，不同层次之间有可能相互渗透，一个目标可能同时具有多个层次的属性。例如，充分就业既是底线目标（防止大规模失业引发社会动荡），也是工具目标（通过就业增加居民收入），还是状态目标（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另一方面，优先级会有动态变化，不同发展阶段中各目标的优先级会有所不同。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长的优先级更高；而在新时代，共同富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优先级显著提升。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短期矛盾，需要在实践中进行动态平衡。例如，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效率与公平之间，均需要找到最佳结合点，总体上，国民经济运行的目标实质上是“一个最终目标与三层实现机制”的严密体系。

（五）技术工具

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借鉴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技术工具和分析方法。

第一，借鉴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参照系和基本工具。具体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人是具有社会主义道德情操的理性人，即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人为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和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动力机制，进而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理论支持和判别标准。阿罗—德布鲁定理刻画了有效市场的基本形态，为其运行提供了理论基准。科斯定理是连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重要理论桥梁，为有为政府提供基本的理论依据和行动起点。

第二，借鉴运用现代经济学中系统分析的方法。例如，传统的投入—产出分析、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及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等。鉴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复杂性，现代经济技术工具是剖析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方法支撑。

第三，借鉴运用管理学中系统论技术工具和方法。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研究这一复杂系统通常需要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包括一般系统整体层次法、控制论反馈与稳态法、耗散结构理论、自组织理论、突变论、协同学、系统动力学等。

第四，借鉴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该方法可用于分析

市场机制无法解决、需要国家来解决的利益不一致问题。借鉴运用现代经济学、管理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技术工具、方法，能够极大推动深入研究中国国民经济运动的过程及其规律性，从而构建逻辑自洽、通俗易懂的中国叙事体系。

（六）学科内容

综合前文分析，涵盖历史、资源、制度的国情基础是中国国民经济学的研究起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观、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国民经济学的价值判断依据。宏观经济管理的四个基本目标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以及由主要目标进一步延伸出的国民经济的系统运行方式、结构分析、政策工具和目标反馈，是中国国民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沿着“国情基础→价值目标→系统运行→结构优化→政策调控→目标实现→效果检验”的思路探索中国国民经济学的逻辑架构，可以发现，中国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显著区别于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和德国的国民经济学，它既积极运用了现代经济学的技术工具和研究成果，又根植于中国实践，摆脱了对西方范式的盲目照搬和简单套用。具体地，在研究对象的确定上，中国国民经济学系统研究国民经济系统的基础、目标、运行、调控和反馈的发展规律；在研究目标的选择上，中国国民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国家—国民—国别”三位一体的辩证统一，核心是实现可持续、公平、代际均衡地增进全体国民综合福利的目标。

（七）总体概括

从学科定义看，中国国民经济学是基于中国国情和价值目标，研究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框架下，如何运用政策工具来调节经济运行，从而实现可持续、公平、代际均衡地增进全体国民综合福利的科学。由此可知，中国国民经济学的规范性体现在它的价值判断上，而其实证性体现在它的科学方法上，因而中国国民经济学是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经济学。

从存在基础看，国民经济学产生的一般原因是“国家本位”，即“国家—国民—国别”三位一体导致一国经济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无法通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范式来替代，因而它在主流经济学形成之后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

从核心概念看，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有五个：国民、国民经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全体国民综合福利。其中，全体国民综合福利是一个多维、动态、普惠、代际兼容的整体性福利框架，它是对传统的“GDP至上”发展观的超越。全体国民综合福利的核心构成体现在基础层的物质与生态福利、核心层的人力资本与发展福利、保障层的生态环境福利、升华层的社会文化与精神福利四个方面。

进一步地，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管理的目标，可持续、公平、代际均衡地增进全体国民综合福利是一个经得起当代哲学和经济学双重审视的严谨概念。其中，持续强调福利的长期性，公平强调福利的普惠性，代际均衡强调福利的代际传递性；“增进”意味着全体国民综合福利是一个持久的改善过程，永远有改进的空间，不存在帕累托最优，这就巧妙地避开了“为追求总量最大化而牺牲个体合理利益”的逻辑陷阱。显然，可持续、公平、代际均衡地增进全体国民综合福利这一目标，与古典经济学重视国民财富增长而非福利增加的观点[3]401-660，与庇古用货币直接或间接衡量国民福利从而求解福利最大化的旧福利经济学观点[14]，与不再强调“国民福利总量”“收入均等化”转而以帕累托最优为核心标准的新福利经济学观点[15]，与凯恩斯学派用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代替国民福利的观点[16]，以及与奥地利学派强调个人主观价值和自由选择、反对集体福利的观点[17]，有着根本区别。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目标，可持续、公平、代际均衡地增进全体国民综合福利，是对共同富裕内涵的丰富和具体化，其学术语言更精确、维度更全面、过程性更突出、福利内涵更丰富，从而便于进行理论建模和量化分析，以及刻画发展的连续性、长期性和动态化过程。

总之，中国国民经济学的标识性概念是国民经济，这个标识性概念由“一个核心与多个支

撑”构成。其中，核心是“国民经济”，多个支撑包括其存在基础的特殊性支撑（“国家—国民—国别”三位一体）、价值目标的特殊性支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行方式的特殊性支撑（有效市场+有为政府+调控政策）、实现结果的特殊性支撑（可持续、公平、代际均衡地增进全体国民综合福利）。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思路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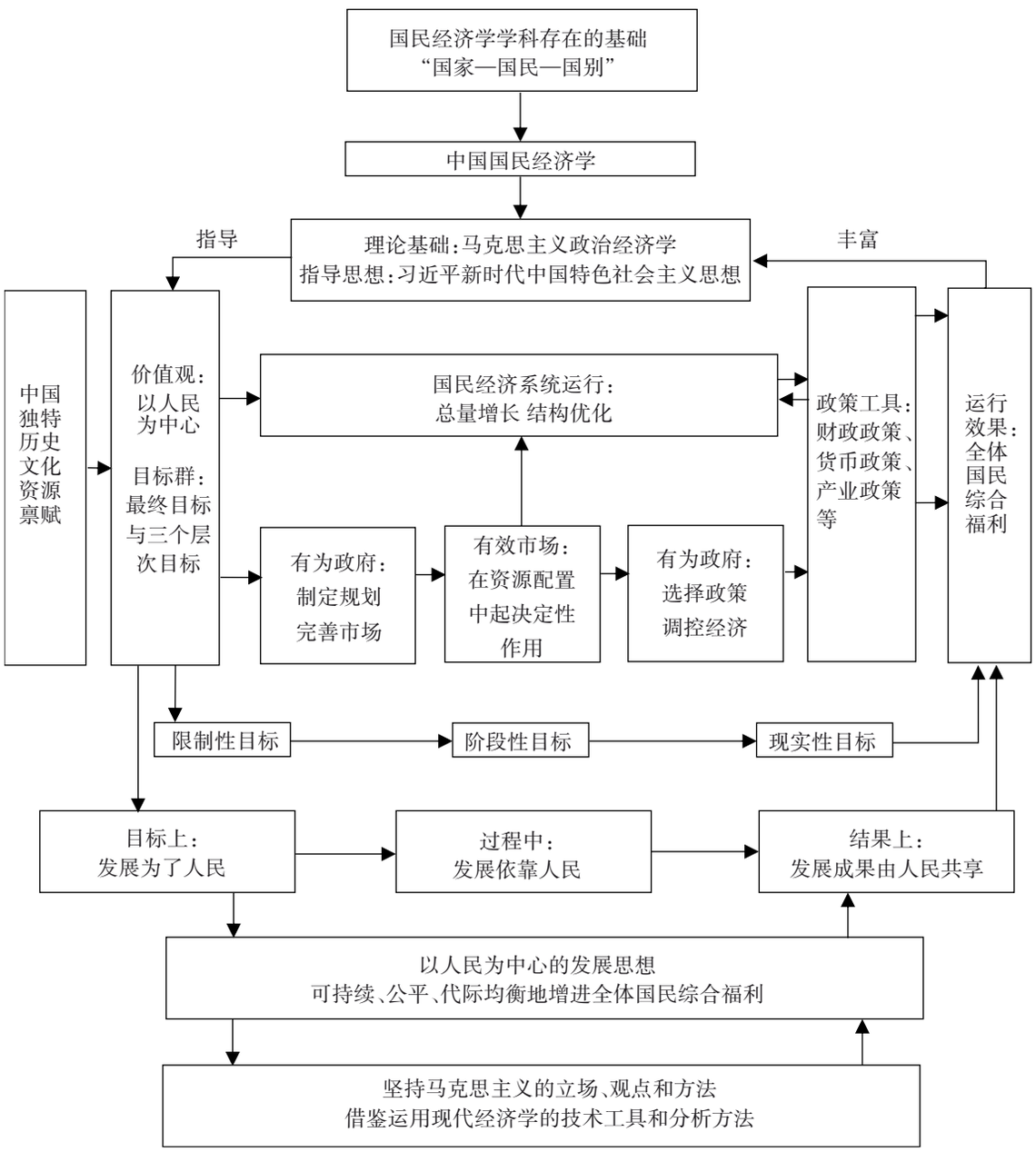


图1　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框架

由图1可知，中国国民经济学知识体系具有自主性与独特性。一方面，中国国民经济学不同于西方宏观经济学。二者在研究对象与范围、核心问题与终极目标、学科体系与内容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区别。中国国民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借鉴运用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现代经济学的技术工具和分析方法，并植根于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理论和自主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国民经济学不同于德国国

民经济学。德国国民经济学的核心部分仍然是宏观经济学，只融入了德国历史学派（李斯特国民生产力理论和罗雪尔的历史方法）、弗莱堡学派与社会市场经济（艾哈德原则、秩序自由主义），以及经济体制比较的分析视角，尤其是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侧重剖析德国经济政策体系、财政政策、社会政策及德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挑战。因此，德国国民经济学总体上是以德国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中国国民经济学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它有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实践基础。目前，世界上只有部分国家开设国民经济学课程，中国国民经济学作为其中独具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正在为国民经济学的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八）构建路径

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宏大工程，需要立足中国实践深化理论创新，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并加强与之相适应的教材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在此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五个关键问题。

第一，注意研究对象的时代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规律性认识，指向政府应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优化资源配置。对于这个特定的研究对象，不能用传统理论和陈旧方法，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守正创新，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第二，避免空洞理论和概念堆砌。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严肃的学术工作，需要扎实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第三，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勇于突破陈规；既要敢于提出自己的原创性观点，又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第四，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运用更科学的研究方法、令人信服的理论逻辑、能听懂的经济学语言，阐释中国理论，讲好中国故事，与世界各国经济学家平等对话，在交流互鉴中实现自我发展。

第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国民经济学是一门治国理政、经世致用的学问，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更为重要的是，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从研究具体问题做起。例如，在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杜两省经调研和模型论证发现，面对企业低投资意愿问题，有为政府需要发挥作用，即提高落后地区企业投资边际效率，设计并建立一个包括公共投资、项目协调、制度建设等多层次、多维度的企业投资引导系统，通过该系统带动企业投资及其他要素向落后地区流动，从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18]。

五、探索中国特色国民经济学和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东财贡献

东财在发展中国特色国民经济学和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特色鲜明、可量化、可验证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形成了在国民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贡献突出、在投资经济学基础研究方面全国领先的核心优势。

（一）理论创新贡献：产出一批原创性研究成果

汪祥春既是中国产业经济学奠基人之一，也是东财国民经济学学科主要创始人。在汪祥春等老一辈学者引领下，东财在探索中国特色国民经济学和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围绕微观基础,大胆进行突破

一是创新性地提出“价格形成二元论”。1987年，汪祥春提出长期生产价格和短期供求决定的“价格形成二元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生产价格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供求分析框架相融合，解决了当时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价格形成基础究竟是价值还是生产价格的长期争论，为计划

价格向市场价格过渡搭建了理论桥梁[19]。

二是提出价格改革的框架和思路。1981年，汪祥春系统性地提出了价格改革的“双层次”框架与“放调结合”思路[20]，契合后来“放调结合、稳步前进”的价格改革方针，为价格双轨制的形成和实施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1982年，汪祥春在国内较早提出自然资源价格理论[21]，为中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是引入影子价格理论。1981年，汪祥春将影子价格理论引入国民经济管理和投资项目评估[22]，为后来中国建设项目经济评价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支持。汪祥春的价格理论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导向，他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又大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为研究中国从计划价格体制向市场价格体制的转型逻辑作出了理论贡献。

2.聚焦宏观调控,提出政策建议

一是提出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突破性理论。1981年，汪祥春提出宏观调控与价格机制协同理论[20]，该理论认为价格机制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要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进行调控。1991年，汪祥春明确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划分标志，二者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23]，这一观点具有超前性。

二是提出治理通货膨胀的系统方法。汪祥春针对1980—1990年中国两轮通货膨胀，提出了通货膨胀综合治理观点，认为中国转型期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和体制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要采取综合措施治理通货膨胀[24]。

三是提出转轨时期中国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与目标。杜两省和李秉祥基于在世界银行和荷兰中央银行的工作经验，针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提出了不同于当时主流的转轨时期“扩张论”“长期紧缩论”政策主张，建议中国在转轨时期采取“适度从紧、适时微调”的货币政策[25]，为1997年之后中国货币政策从“适度从紧”向“稳健”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持。

四是提出并深入研究货币政策的可信性问题。路继业和杜两省创新性地将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系统引入汇率制度选择研究，探讨了利益不一致对货币政策可信性及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明确区分了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最优汇率制度选择[26]，为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汇率制度改革提供了清晰的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并对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货币政策选择和汇率制度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

五是深入研究中国宏观调控的体制基础、政策绩效和创新模式。庞明川针对当时学术界关于宏观调控效果的争论，提出从体制基础角度分析宏观调控问题，认为中国宏观调控不能照搬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模式，必须与中国经济转轨的体制基础相适应[27]。在此基础上，庞明川又以历史演进为线索总结实践经验，对每个阶段的政策工具组合和实际经济效果进行了具体评估[28]。庞明川明确区分了中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的概念差异，系统论证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结构性”特色，为后来提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结构性范式奠定了基础[29-30]。

3.深入研究投资问题,拓展国内研究

一是投资理论基础创新。杜两省针对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投资规模膨胀现象，深入分析了企业投资自我调节机制问题[31]。杜两省提出了投资的第二种乘数理论，分析了瓶颈部门投资通过其生产能力效应对国民经济增长产生重要促进作用[32]，完善了投资乘数理论体系。杜两省和张传吉提出了投资二重效应理论，从投资的“需求效应”“生产能力效应”角度建立测度方法，评估国民经济运行的双重作用[33]，弥补了传统理论仅考虑单一效应的缺陷。

二是出版相关学术专著。杜两省通过建立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系统分析投资的规模、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版了国内较早系统论述国民经济中投资问题的学术专著《投资与经济增长》，该成果荣获辽宁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专著一等

奖。针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困惑，杜两省提出转变增长方式不是否定投资作用，而是调整投资方式，即向集约型投资转变，出版了《有效经济增长与投资方式变革》。在《中国的投资效率与经济可持续增长》一书中，庞明川从投资规模、投资结构、产权结构和投资体制角度分析了这些因素对投资效率及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34]，该书是国内较早系统研究中国投资效率与经济可持续增长关系的学术专著之一。

三是分析投资效应及其政策含义。马秀岩等系统研究投资双重效应及其计量方法[35]，对后续投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宏观投资统计指标体系的完善产生了重要影响。马秀岩关注到转轨时期中国投资波动的新变化，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并建立健全投资风险约束机制[36]。

四是在抑制产能过剩与治理重复建设方面，相关研究取得丰硕成果。2014年，王立国依托其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抑制产能过剩与治理重复建设对策研究”，深入研究了体制性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提出治理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该项目是国内较早系统研究体制性产能过剩问题的国家级重大课题之一，提出的“内部成本外部化”理论框架成为解释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经典理论之一，为国家制定和完善产能过剩治理政策提供了决策参考。基于本课题的研究成果，韩国高等进一步测度和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波动及成因[37]。

4.探索自主知识体系，勇于提出东财见解

一是提出了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总体框架。杜两省作为东财国民经济学学科带头人，提出了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路。

二是从风险分析、激励机制和控制系统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和难点，并提出系统性政策建议。依托杜两省2012年获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和难点：风险分析、控制系统和激励机制研究”，团队在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和微观风险进行识别、溯源、评估和排序的基础上，构建了科学的风险控制系统与合理的激励机制[38]。该研究成果于2021年6月荣获第八届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省政府奖）一等奖。

三是揭示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孔宪丽等研究发现，中国33个工业行业技术进步偏向差异明显，存在技术进步方向与要素禀赋不匹配的失衡现象[39]。该研究提出，需要引导各行业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特点进行合理的技术创新选择，该结论为技术选择与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了精准指引。齐鹰飞和LI Yuanfei将生产网络引入多部门一般均衡框架，系统研究了财政支出部门配置对宏观经济的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发现财政支出向高新技术产业调整可显著提升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40]，为稳增长与调结构协同提供了理论依据。谢佳松等证实公共数据通过信息供给、协调强化双机制激励突破式创新[41]，为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与经验支持。

四是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和政策支持。吕丹等认为，高速公路取消收费会通过企业集聚和人口集聚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42]，为高速收费改革提供了实证证据。张同斌和付婷婷认为，撤镇设街道可以通过完善基建、改善公共服务、优化土地结构实现人口集聚，促进人口结构的年轻化[43]。郭晓丹等认为，破解区域失衡需要同步优化大城市内部资源配置结构，提升中小城市资源配置效率[44]。周彬等认为，要素配置效应的区域差异是近年来中国南北地区经济分化的主要原因[45]，这一结论为分类施策优化区域要素配置提供了经验支持。陈太明将宏观经济周期波动与城乡二元分割、区域发展不平衡两大结构性问题相结合，证明经济波动会放大城乡、区域之间的福利差距[46]，实现了宏观周期理论与收入分配、民生福利、结构失衡研究的交叉融合。张国建等创新性地从区域视角量化评估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政策效果，发现扶贫改革试验区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正向的区域溢出效应和明显的政策异质性[47]。刘晨晖和陈长石认为，技能匹配

度决定地区经济差距的收敛性，高技能劳动力持续向南方地区集聚，形成了更高的技能匹配效率和更强的技术溢出效应，是造成南北差距的重要原因[48]。

（二）学科建设贡献：确立全国性特色学科标杆

第一，投资经济学特色突出，体系完整，保持全国领先水平。自1974年以来，东财不断加强投资经济学师资队伍建设，积极进行投资理论研究创新，加强人才培养，建成了国内为数不多的以“投资经济”为核心特色的国民经济学本硕博一体化培养体系，拥有应用经济学（A类）一级学科支撑下的国民经济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工程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两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作为实践延伸。

第二，投资学专业的行业影响力显著。作为“国民经济学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首批19所发起单位之一，东财是全国投资经济方向的标准制定者和人才培养中心，其“宏观投资战略—中观产业投资—微观项目评估”的学科框架被全国多所高校借鉴。专业认证与评估成绩突出。工程管理专业4次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专业评估（获评为优秀，位居全国财经高校前列），工程管理和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两个本科专业全部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拥有国家级一流课程2门、省级一流课程15门。

第三，国民经济学提升层次，实现差异化发展。东财国民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分别由公共管理学院、投资工程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承担。在公共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主要研究国民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方法、国民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地区经济与城市发展，培养特色侧重于宏观经济管理、经济政策分析和政府经济职能等方向，与公共管理学科、经济学科深度融合；在投资工程管理学院，硕士阶段的研究方向侧重投资经济，博士阶段的研究方向侧重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培养特色是将国民经济学与投资学、工程管理学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投资经济”研究方向。

（三）教材体系贡献：形成相对完整的教材体系

汪祥春和傅晓声主编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提出计划管理必须尊重价值规律、运用市场机制的观点[49]，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思想解放意义，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内计划经济学领域的重要教材和参考书，被全国多所财经院校采用。汪祥春和宋则行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概论》，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调节理论的教材之一，作为全国经济计划干部培训教材，该书对提高中国经济管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东财的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师信和邓明发主编、11所高校相关专业的教师参编的《中国经济计划方法》，是对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编制方法的全面总结和系统介绍，影响多所高校的国民经济学教学。王雅莉和江勇主编的《宏观经济管理》是国内较早系统阐述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高校教材之一，该教材不仅重点阐述一般宏观经济管理对象，还系统阐述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主体、客体、活动，以及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及其微观基础和市场中介[50]，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宏观管理理论体系。

在投资经济学领域，东财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教材体系。钱从龙和张仲敏主编的《投资学》多次再版，成为高校经典教材。马秀岩主编的《投资经济学》构建了包含政府投资、企业投资等在内的完整体系，被全国80%以上开设投资经济专业的高校采用。王立国主编的《项目评估理论与实务》（第6版）是国内工程管理、投资经济专业的核心教材。武献华、宋维佳和屈哲合编的《工程经济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四）人才培养贡献：输送国家急需的宏观经济研究和管理人才

人才培养既重视规模，更追求质量。截至2025年，学校累计培养国民经济学专业博士93人、硕士766人。早期的毕业生中既有中国数量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奠基人才，也有区域经济学领域的领军人才。后来涌现出从事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优秀学术带头人，其中不少成长为相关领域的中坚力量，还有在国家和地方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任职的毕业生，在政策咨询和管理实践方面

发挥作用。此外，还有许多在各类金融机构任职的毕业生，以及众多在实际工作中默默奉献，成为领军人才和业务骨干的毕业生，成长为行业中坚力量。学校形成了“理论扎实、实践突出、财经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成效显著。毕业生在投资项目决策、宏观经济分析、工程管理等领域具有明显竞争优势。

（五）智库服务贡献：为国家战略提供强有力智力支撑

东财东北全面振兴研究成为国家智库品牌。东财东北全面振兴研究院荣获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智库和中国智库索引（Chinese Think Tank Index，CTTI）来源智库双重权威认证，其发布的《东北全面振兴发展报告》连续多年被评为CTTI智库优秀成果，构建的东北振兴评价指数成为国家评估东北振兴政策效果的重要工具。决策咨询成果转化率高。近五年，国民经济学学科团队共有12项研究成果获中央和省部级领导批示，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报送政策建议40余份，其中，关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产能过剩治理、政府投资管理等方面的建议被直接采纳。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成效显著。东财承担了辽宁省及大连市“十四五”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重大课题30余项，为地方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成为东北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库”“智囊团”。

综上，东财走出了一条理论创新、特色强科、教材引领、精心育人、服务国家的发展道路，其以投资经济为突破口的特色发展模式，为中国应用经济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其编写的教材、培养的人才、产出的智库成果，已经深度融入中国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

六、结　语

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承载着解释中国发展、服务国家战略的学术使命。从“经邦济世”“富国裕民”的传统经济治理思想的历史滋养，到近现代国民经济理论的本土化探索，再到新时代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仍任重道远。东财在国民经济学领域持续深耕，几代学者接续努力，在理论研究、学科建设、智库服务等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但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宏大工程，非一日之功、单方之力便可完成。展望未来，东财将始终秉持开放包容、谦逊务实的学术态度，与全国学界携手并进，在守正创新中持续探索，在交流互鉴中共同提升，不断发展完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深厚学理支撑、重要国际影响的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繁荣中国学术贡献智慧与力量。

参考文献：

[1] Victor-lucien 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reign of Henry IV[EB/OL].(2026-05-10)[2026-05-27].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Henry-IV-king-of-France/The-achievements-of-the-reign.
[2] 弗朗索瓦·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吴斐丹,张草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97-300.
[3] 亚当·斯密.国富论[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4] Encyclopaedia B. Laissez-faire[EB/OL].(2026-05-26)[2026-05-28].https://www.britannica.com/money/laissez-faire.
[5] Ortes G. Della economia nazionale[C]//CUSTODI P.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Vol. 21-22. Milano: Nella stamperia e fonderia di G.G. Destefanis,1804.
[6]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19-131.
[7] 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M].朱绍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16.
[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5:1-209.
[9] 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J].经济研究,1956(6):30-38.
[10] 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1-130.

[11] 《国民经济管理概论》编写组．国民经济管理概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1-195.
[12] 宋则行，汪祥春．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概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1-357.
[13]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重磅首发！这些概念值得期待[EB/OL]．(2025-06-23)[2026-05-29]．http://ae.ruc.edu.cn/xwzx/xydt/30ffce563fbb44f6a40568492047028b.htm.
[14] 阿瑟·塞西尔·庇古．福利经济学：上[M]．朱泱，张胜纪，吴良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7-28.
[15]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10135-10137.
[16]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郭武军，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3-304.
[17] 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M]．刘絜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52-96.
[18] 杜两省．内部收益率的区域差距与政府的投资诱导系统[J]．财经问题研究，2009(4)：66-74.
[19] 汪祥春．关于价格体系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J]．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87(2)：32-36.
[20] 汪祥春．对我国当前价格改革问题的初步认识[J]．财经问题研究，1981(2)：22-28.
[21] 汪祥春．谈谈按边际成本定价问题[J]．价格理论与实践，1982(3)：51.
[22] 汪祥春．影子价格的应用[J]．价格理论与实践，1981(5)：61-63.
[23] 汪祥春．计划与市场结合的优化与价格改革[J]．中国物价，1991(7)：14-18.
[24] 汪祥春．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率[J]．价格理论与实践，1990(1)：8-11.
[25] 杜两省，李秉祥．转轨时期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与目标[J]．中国社会科学，1997(1)：87-97.
[26] 路继业，杜两省．货币政策可信性与汇率制度选择：基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J]．经济研究，2010，45(8)：16-28.
[27] 庞明川．中国宏观调控的体制基础与政策绩效[J]．世界经济，2008(7)：88-96.
[28] 庞明川．从紧缩、扩张、稳健到“双防”：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体制基础[J]．财贸经济，2008(6)：98-102.
[29] 庞明川．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模式与理论创新[J]．财经问题研究，2009(12)：17-24.
[30] 庞明川．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结构性范式及形成逻辑[J]．财经问题研究，2016(12)：3-12.
[31] 杜两省．论企业投资自我调节机制[J]．投资研究，1986(11)：21-24.
[32] 杜两省．论投资的第二种乘数——兼评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J]．投资研究，1990(6)：42-48.
[33] 杜两省，张传吉．投资的二重效应及其测度[J]．投资研究，1995(5)：32-36.
[34] 庞明川．中国的投资效率与经济可持续增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230.
[35] 马秀岩，武献华，刘秋雁．论不同效应下的投资效果系数[J]．统计研究，1992(5)：43-46.
[36] 马秀岩．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投资波动及其启示[J]．财经问题研究，1999(7)：27-31.
[37] 韩国高，高铁梅，王立国，等．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测度、波动及成因研究[J]．经济研究，2011，46(12)：18-31.
[38] 杜两省，王晓姝，陈太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控制系统[J]．财经问题研究，2010(7)：18-25.
[39] 孔宪丽，米美玲，高铁梅．技术进步适宜性与创新驱动工业结构调整——基于技术进步偏向性视角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5(11)：62-77.
[40] 齐鹰飞，LI Yuanfei．财政支出的部门配置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生产网络模型的分析[J]．经济研究，2020，55(4)：86-100.
[41] 谢佳松，樊嘉诚，林建浩．信息摩擦、公共数据与企业创新边界[J]．经济研究，2025，60(11)：51-73.
[42] 吕丹，闫昱睿，张军涛．高速公路取消收费与区域经济增长[J]．中国工业经济，2026(1)：76-98.
[43] 张同斌，付婷婷．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人口集聚效应：以撤镇设街道为例[J]．世界经济，2026(1)：177-208.
[44] 郭晓丹，张军，吴利学．城市规模、生产率优势与资源配置[J]．管理世界，2019(4)：77-89.
[45] 周彬，吴丽芳，周彩．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要素配置效应及扭曲程度测算比较[J]．统计研究，2023(8)：46-58.
[46] 陈太明．中国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差异性研究[J]．管理世界，2008(5)：12-29.
[47] 张国建，佟孟华，李慧，等．扶贫改革试验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政策有效性评估[J]．中国工业经济，2019(8)：136-154.
[48] 刘晨晖，陈长石．劳动力流动、技能匹配与地区经济差距[J]．经济研究，2022，57(7)：45-63.
[49] 汪祥春，傅晓声．国民经济计划管理[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1-493.
[50] 王雅莉，江勇．宏观经济管理[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1-384.

Thoughts on Building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National Economics: Exploratory Journey of Nation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tributions of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U Liangsheng[1], LYU Dan[2], ZHOU Bin[3]

(1. School of Econom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2. School of Investment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3. Institute for Northeast Full Revitaliz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Summary: In recent years, as China'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has grown alongside its economic expansion, coupled with its uniquely distinctive development path, Chinese National Economics has garnered increasing attention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Particularly since the advent of the new era, it has become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building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national economics. In this regard,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s undertaken active explor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brief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s development and the exploratory journey of nation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is, it outlines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in exploring nation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building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national economics. On the one han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auses, foundations, evolution, and future direction of national economics. It further identifies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national economics.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framework and new ideas for building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national economics, covering aspects such as foundational principles, guiding ideology, value judgments, goal selection, analytical tools, and disciplinary content.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Chinese National Economics differs significantly from Western macroeconomics and German National Economics. It actively incorporates the analytical tools and research findings of modern economics while remaining rooted in Chinese practice, thereby breaking free from the blind replication and simplistic application of Western paradigms. Specifically, regarding the definition of its research object, Chinese national economics systematically studies the developmental laws governing the foundations, objectives, operations, regul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In terms of research objectives, Chinese national economics adopts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focusing on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state-citizen-nation" trinity, with the core objective of serving the sustainable, equitable, and intergenerationally balanced enhance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welfare of all citizens.

Key words: national economic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national economy; national comprehensive welfare;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责任编辑：刘欣琦）（校对：巴红静）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6.09.001

[引用格式]杜两省，吕 丹，周 彬．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思路——兼论中国特色国民经济学探索历程与东财贡献[J]．财经问题研究，2026(9)：3-18.